

【美】艾伦·弗里曼 (Alan Freeman)

联系方式:

地址:伦敦特纳大街62号 SE10 0SD

电话: +44 20 7983 6569

传真:

手机: +44 7789963401

电子邮件: afreeman@iwgvt.org

个人主页:

邮政编码:

艾伦·弗里曼是一位为大伦敦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专为伦敦市市长分析小组工作。他现在在休假研究，还是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的研究院。

在大伦敦政府研究组他负责最低生活工资、创新，文化、基准测试世界城市等工作。

他负责写作了托尼·班尼特的传记《班尼特非正统》。他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发表了52篇论文，还在互联网上开了一个专栏: <http://ideas.repec.org/e/pfr102.html>。他还与别人合著了四本书，其中包括“马克思、李嘉图和萨拉法”。

他的本科学位是在伦敦大学数学专业获得的，之后又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在伦敦伯克贝克获得了经济学理学学位。他的教授生涯其中包括了15年的编程，13年在格林威治大学做高级讲师，还有7年在大伦敦政府做经济学家。他会说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和土耳其语，他还曾经简短的做过头四种语言的口译工作。

他和安德鲁·克里曼合作编辑了即将出版的期刊政治经济学批判 (www.copejournal.org)，合作组织科国际价值研究学会 (www.iwgvt.org)。他还是一个位于伦敦的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协调者。

投资文明

【美】艾伦·弗里曼

我们有能力切断太阳光和星光，因为它们不分红利。在人类文明史上，伦敦是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却无法达到其居民能力范围内成就的最高标准，因为他们负担不起。今天，如果我有足够能力的话，肯定会赋予我们省会公民在其个人能力范围内所能达到的艺术和文明附属物的最高标准。请深信我所创造的，所能承担的，并请相信我所花费的金钱，不仅仅比任何赈济金要，甚至根本就没有发放赈济金的必要。(John Maynard Keynes)^a

政府和危机：引言

在本章我质疑政府如何解决目前的危机问题^b。通过比较政府解决1893年和1929年危机的策略可知：任一种情况之下，一段时期的金融混乱之后，世界经济必然长期缓慢发展，然后风暴引发国家剧烈变动，最终促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狭义的经济术语中，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法。

在此，我主要陈述两条结论：首先，公众，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大大低估了所需政府行为的规模；其次，这种行为绝不单纯是针对经济。过去，同当前这场规模相当的几次经济危机，都予以解决了，但也导致了“文明”的变化：影响深远的、甚至我们现在仍在进行当中的文化革命以及社会转型，并塑造了迄今为止的整个时代。这些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却被我们错误地忽略了。

目前的趋势是将这种变化作为特定经济环境之下的产品或技术创新。在这些危机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相反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已经瘫痪了：只有采取政治行为为这只有形的手。而无论是1893年还是1929年，政府的作用均不可低估：这些危机发生时，国家构建经济结构，拨出财政加以支援，并进行了结构重组。

我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利用这些结论指导实践。如果限制在狭义经济之下，将大量的金钱花费在一系列的活动上，则会酿成错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远见，指导每一个经济方案，正如战后的福利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职能一样。摆脱危机的过程构成一种迅速升级的“人力资本”-政治权利受益人的生产潜能。用小布什独特的话来说，这种权利对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经济学家错误的将其描述为一种纯粹的成本，一种损耗、亏损。然而，文明是一种资本。

a J.M. Keynes, Dostaler, Keynes and His Battles.

b 谨以本章献给以下几位。本章选自 Carlota Perez 和 Christopher Freeman 的文章，献给 John Harrison 和 Andrew Glyn。他们的创新精神为经济统计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迫于需要不得已而停止本章成形于 Graham Hitchen 的 'Creative Breakfasts' 中，此著作较有启发性，且提供了大量信息。当然，对于论文中的错误之处，由本人承担。

投资人本身要具有远见，即21世纪的社会是如何将最先进的成果传达给公民，而如今，这也许已成为可能。这就要求新的权利，既能表现人类的本质也能展现其潜力：创造的权利、思考的权利、互助的权利、扶持的权利。对享有特权的人来说，这些能力可以获得。欲要摆脱当前危机，就要在所有人当中普及这些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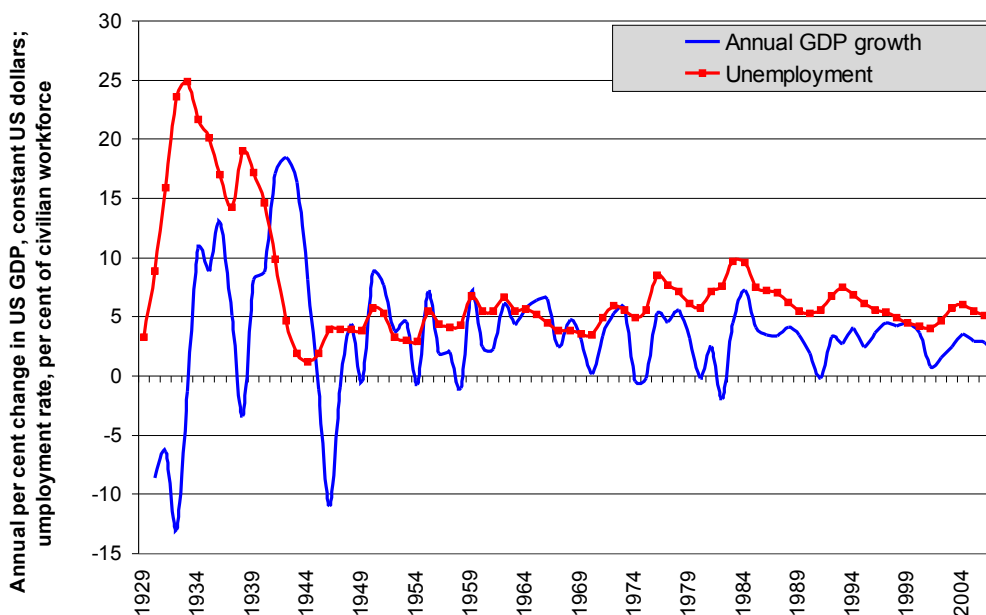
在制定这些方案中，首要问题是不平等和可持续性的问题。目前而言，我们冒着毁灭地球的危险、以遭受赤贫为代价，才取得了世界公认的“西方文明”。在当今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已达到贫穷国家20倍的世界^a，在寻求根本解决方案的道路上，肆无忌惮的贪婪和过剩并存的壮观景象以及大规模的饥荒地带，我们仅专注于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制止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但这些可以理解的观念并没有唤起现实给予的希望。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矛盾在于，同一个地球上，曾经难以想象的自给自足与现在无法接受的剥夺两者的巧合。世界人口平均年收入6000美元，比1950年西方人均收入还多。因此，在物质生活上，没有人缺乏也就没必要耗尽地球。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改变的空间。如今，经济增长确实需要加重地球负担，发达国家70%的工人和中国40%的工人都从事于服务业，非生产食物或商品。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引，经济增长不是导致地球耗尽能源，而是使得智力和人类潜在能力达到某种水平，这种水平既符合我们的能力，也可以使我们自给自足。总之，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利用这种潜力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而且如果只要做到这一点，文明便可实现其价值。

交易，冲突和战争

图5-1 1929-2007年美国失业人数和GDP增长情况



a Freeman, A. The Poverty of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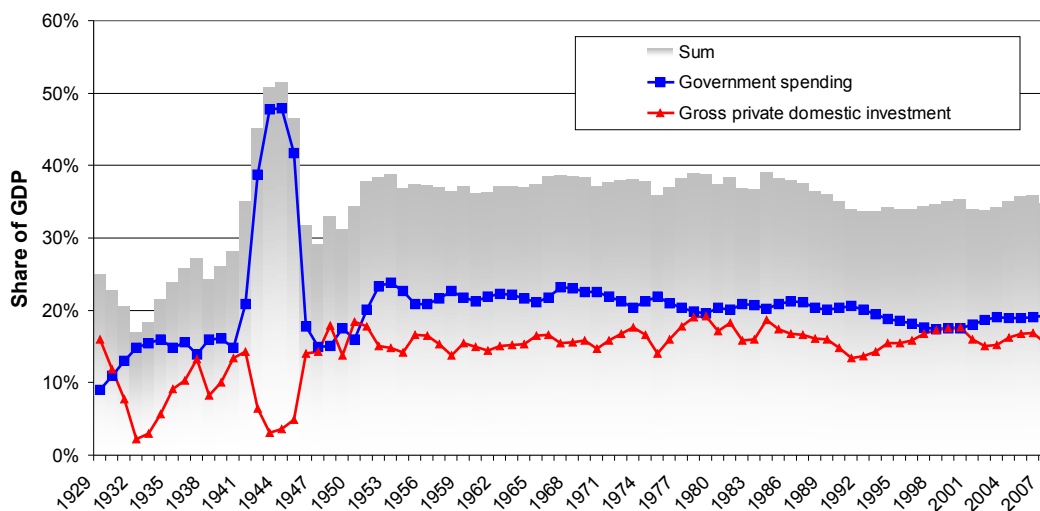
来源：GDP增长，BEA；失业，BLS CPS系列，Dunlop 和Galenson^a

如果对政府以前所为并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不能估量出它的未来决策和职能。因此，我从1929年之后的经济复苏开始分析，图5-1显式了美国失业水平及其增长率，表明其实际复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1933年至1936年，新政使失业率从25%降低到15%，经济年增长率为12%。但是在随后两年伴有轻微的经济衰退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新政的停止不仅是因为37、38年的衰退，而是伴随战争年代的惨淡背景。在1939年至1944年间，经济年增长率为14%，失业率降到2%，这是近十年来值得庆贺的事。194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用于战时支出，超过此前或之后任一时期。这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就业率最高的时期，打破了政府阻碍经济增长、影响经济效率、妨碍经济繁荣的舆论。

图5-2：1929年-2007年美国政府消费和固定投资金额



来源：BEA

确切的说，国家对显著扩充负有多大责任？

图5-2显示出了两种政府行为：取代大量的私人消费开支，使其从1933年的83%（1939年占73%）降低到1944年的49%，很显然，一直到2003年才打破这长期低靡的状态，达到70%。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取代了私人投资，使其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仅高于1933年的低谷。政府成为国家的投资者。其在非住宅投资当中所占份额增加了一倍多，^b从1933年的25%到1944年的53%，剩下的直到1973年保持在40%以上-关键之处在于，美国经济的问题首次变得棘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的建议（见Desai这卷）最激进的两条实际上是在战时实施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和平，其次是投资社会化以及食利者的正常消亡。

这就在我们目前面对的困难的的核心当中形成了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中心论。我们无法理解：1942年是美国复苏的起始期，无论是从就业、产出，还是利润上。后来的分析表明，1893年的复苏也是军事扩张的直接结果，帝国主义竞相征服的

a Dunlop 和 Galenson, Labo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 图中并未显示

浪潮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终止。

战时国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打破了效率潜在低下的观点。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功地让市场来决定制造多少坦克。同时，它也解决了一个困惑争论，即国家是否可以拯救资本主义。当然可以，它已经做到了，而且取得了两次成功。并且此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如何在没有本金的情况下重复取得成功？

不考虑战争的起因，国家对经济持久影响的根本之处在于，至少在1929年复苏后期，我们也许可以定义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措施。这些措施是逐步展开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取得了资本主义的成就。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形式很明显限制了这种扩张，并将这种扩张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据目前所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在1893年之后的复苏中尤为明显，由军事扩张推动所致，我们在本章稍后会提到。

于是，政府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措施：一边摧毁，一边建设。能否将这两个方面分离开呢？当然可以，但只在完全脱离军事背景之外，才可以实现这种普遍性包涵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前提条件。普遍性的转变一直有其社会合理性，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居住环境。而目前，这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和平方式。

实际的新政策：作为经济力的文明

美国新政策的出台并不只是用来刺激经济发展，对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系统而言，也不只是一时飞跃。像欧洲的福利国家，从政治角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新政来解除长期深远的市场失灵的社会影响。出于对遭受痛苦人们的同情以及对政治后果的担心，这些体制的策划者们规定：使“人民”可以分享资本主义成果，然而，如果仅限于少数几个镀金者的话，则是具有毁灭性的。他们的目的是获取政治权利，包括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最重要的，就业方面的权利得到保障，不论是通过提出政治诉求还是强制执行的方式——政策的实施要确保从社会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这是战后“普遍利益”形成的根源所在。

从主体经济来看，这些变化取得的经济收益可以忽略不计，只能视为一种纯粹的成本。但是，他们不仅扩大了在教育 and 卫生方面、30年的新自由主义仍未消除的需求，同时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

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必须澄清，“福特主义”的经济作用被广泛认同。^a福特汽车廉价出售给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一个以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为主导的时代的标志：汽车、洗衣机、吸尘器、冰箱、唱机、收音机、电话、吹风机、电饭煲、电视机-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将战后这段时期称为电器时代。很少有人认为国家修建了汽车行驶的道路，它还建立、资助、或至少计划建立电力和电话线设施、供水系统、污水处理厂和大众过境这些问题，从而使现代城市里汽车驾驶成为可能，其零部件得以制造和使用。

此外，它超越了物质界限，创造了大众教育，社会住房，医疗保健，退休金和

a 更多信息请参见Harvey, Aglietta 和 Fernbach的著作。

公共领域：广播，城市建筑，公园，博物馆和公共场所。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最起码，通过保障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资不被持续的无序竞争降低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水平，它创造了一个工人阶级可以买得起自身生产的产品的时代。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成为“道义上和历史的”工资组成部分的管理者。

精确地讲，这是对文明的投资，它使得工人更健康、学识更多、能力也更强，将学生毕业年龄增加两年、三年甚至八年，改变工人生产产品的种类。其措施是有限的、并且执行起来往往犹豫不决，自身也存在着矛盾：大规模女性劳动力的形成所导致的额外负担尚未缓解。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她们对经济繁荣与生产力日益提高的贡献额，趋于等同甚至有可能大于机器这一劳动力。战后西方国家的受教育人群成为雇员，并成为国家的生产性资产。无论从新政的短期影响来看还是战争方面而言，如果没有这项投资的话，其后30年的繁荣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战后社会起源

除了一个对西方民主的模糊承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丘吉尔从广告性的基调出发，提出了“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不完全相悖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然而，战争的经历，如在1914至1918年间，唤起了人们对于平等、公正社会的追求。同一战不同的是，1945年战时情绪在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构成了一项普遍议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公民并没有为立即重新追求私利和牟取暴利做好准备。诸如Addison等作家们注意到，直到1950年，在英国多数地区出现的平等主义思潮，仍然认为定量配给是最公平的经济体系。在加拿大，在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大力支持国家继续控制战后经济，至少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保持零售价格上。^b在美国，冷战至少延续了5年，麦卡锡主义实施时间更长，之后才恢复到从前。而且直到里根时代，自由市场价值才真正深入到美国社会表面之下。

对于本身就是一场孩童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有各自的普遍性议程。尽管“社会主义全国化”自身就存有矛盾，但共产主义的影响并未受到国界限制。当今世界，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妄想通过军事威胁消除它的战争赔偿，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和日本已成为反对红色威胁的主导力量。在德国，福利供给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在阿登纳，福利被赋予了宪法权利。

在反殖民化运动中，这个议程被凸显出来，联合国由此出台了“世界人权宣言”。此宣言签署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成立3年后，宣布了一个世界性的承诺，即健康权、受教育权和住房权。这个非同寻常的文件至今还在指导我们进行研究，至今世界还抱着“一天一美元”的Millennial目标，并减少了以往的诸多渴望。

宪章概括出了政府职能的新概念，列举了以往那些关键词语：

“人类这个大家庭，其成员自身均享有尊严和平等权，及诸多不可剥夺之权利。意识到这一点才是世界自由、公正、和平的基础；

^b The Gallup Poll: p342.

“无视和蔑视人权则造成了失去良知的野蛮行为，人们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免除恐惧、摆脱贫困的自由，这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

“联合国成员已在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类尊严和价值、男女平等权的信念，并决心在更为自由的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并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因此，现在大会宣布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和全民的成就标准。”

“消除恐惧和贫穷”与“社会进步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这两条，具体而言，并不只是政治诉求。宪章23、24条声明人人享有工作权、有权享有合理的报酬、休假的权利以及合理的工作时间的权利。第25条规定，每个工人，至少男工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疾、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第26条特别说明，“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这些都是经济提案，当调查经济学家时，我们只会被隐藏在时代思潮下的需求扩张而震惊，我们还必须对于潜在的生产规模进行反思，从宏观方面而言，其政治宣言在表面上其实是一种经济方案。如果违背宣言能够像制定宣言时一样受到尊重的话，这就揭示出了复苏时期的核心矛盾。

这再次向人们提醒了一个关键之处：几乎所有最近的经济分析的失败都是由于生产量的增加，而这是由政治授权批准的。战后经济的增长来源于两个简单因素：其一是来自南半球的大量廉价品，其二是北半球拥有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工人的事实，更何况这些劳动力是免费的在数不胜数的事例中一项数据调查表明：雇主需要支付给一个美国汽车工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比加拿大工人多1500美元。另一个就是隐藏在拥有像宜家、沃尔沃、诺基亚这些国际品牌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不值得庆贺的成就。对于所有新自由主义学说而言，当今世界这些国家的平衡预算明显处于。

这便揭示了今天“刺激”包令人迷惑的一面：人力资本回报既不讨论也不做计算。或者作为需求方提出，或者以最大投资额投资到物质生产当中，关于人类能力的讨论始终停留在“支付”或者“给予”二者之一的能力上，而这种能力取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创新、教育、知识、保健、社团-这些不是成本，而是资本，没有这些，发展是不可能的，那么，又是什么条件使其成为可能呢？

现实下的帝国主义：白色垄断文明

1929年的金融危机是最近的唯一可以与2008年^a的危机相比较的一次，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仅从一个例子推断历史规则是不具普遍性的。因此，对于1893年危机我也进行了这种分析，不仅是因为它支持国家在经济复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证明，而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限定其教化作用，把握其局限性，并深

a 见Desai, R. 和 A. Freeman 的How Bad is US Unemployment?

入了解危机和战争的密切联系。

经济史学家称1873年-1893年间为“大萧条”时期^a，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后，达到了金融恐慌的巅峰，就像此次危机一样引人注目。美国失业率从1892年的3.7%上升到1894年的12.3%（根据一些估计是14.7%），并且直到1900年才仅下降到8.7%。这是紧随Belle Epoque之后的大扩张时期，C. Freeman^b称之为“钢铁、电器和帝国主义时代”，即建造纽约的时代。纯经济术语指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除了少数例外，都毫无疑问的复苏了，直到1929年才下跌至1893年的水平。

此次经济危机和1929年有极大的相似处。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框架来了解这两次危机？军事活动是明显的、表面的共同根源：1893年的经济复苏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政府海外扩张高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经济复苏唯一的积极因素？

并非如此，进一步调查指出，政府干预既不是纯粹的军事战略，也不是纯粹的经济策略。它取决于并且表现出当今的历史矛盾，从最高国际水平来看，这种矛盾在很多意义上得到了解决。18世纪80年代Bismark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老年、残疾保险等法案的制定，将德国定位在其从未真正偏离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轨道上。

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党，由激进自由党建立的“工会”成为 Joseph Chamberlain（1897年“殖民地国务卿”）进行帝国主义征服的手段，准确地说是资助社会改革的手段。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对10万刚果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在欧洲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与西方先进文明相结合的帝国主义时代，残暴丛生。总之，国家采取行动，以确保普遍进步，这是征服者专用的手段。如今，它仍是战争背后必须的力量。

矛盾源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形式，并对其普遍性确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便营造了一个Jekyll 和Hyde化身，将国内的普遍性与一个严重衰退的世界结合起来，我定义为“反动寄生虫”。Cecil Rhodes，德比尔斯公司和罗得西亚公司的创始人证明“为了将4000万英国居民从血腥的内战中解救出来”^c，对于“很容易获得原材料的新土地以及殖民地的廉价奴隶劳动力的剥削”是必需的。

严格而言，这个方案是反动的，它将国家的命运放在了精疲力竭的社会精英手中。我们的生活仍然时有荒诞：英国和加拿大，上流民主社会对于枪口之下的传播者来说，不得不废除世袭统治制度-其荒诞程度稍逊于加拿大最近的政府危机。

旧世界制度之下的腐朽贵族，西方国家完全封建性的军事世袭阶级，过时的或强制性的殖民者征服了他国人民，他们像寄生于人体内的水蛭一样发达。全新的寄生阶级出现了：食利者、唯利是图的冒险者、甚至是全球性的黑帮组织。新的、畸形的种族主义思想随之普遍出现，并认为大众应隶属于那些地位高贵的文明人。法西斯主义是这一思想体系最发达的形式。

这便绝对限制了特权的获得，著名领导家列宁称其为“寄生”^d。铭记这一历史教

a 例如，可以参见 <http://eh.net/encyclopedia/article/whitten.panic.1893>

b Freeman, C. “The Third Kondratieff Wave: Age of Steel, Electrification and Imperialism”

c Bigelow, B. 和 B. Peterson,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p44

d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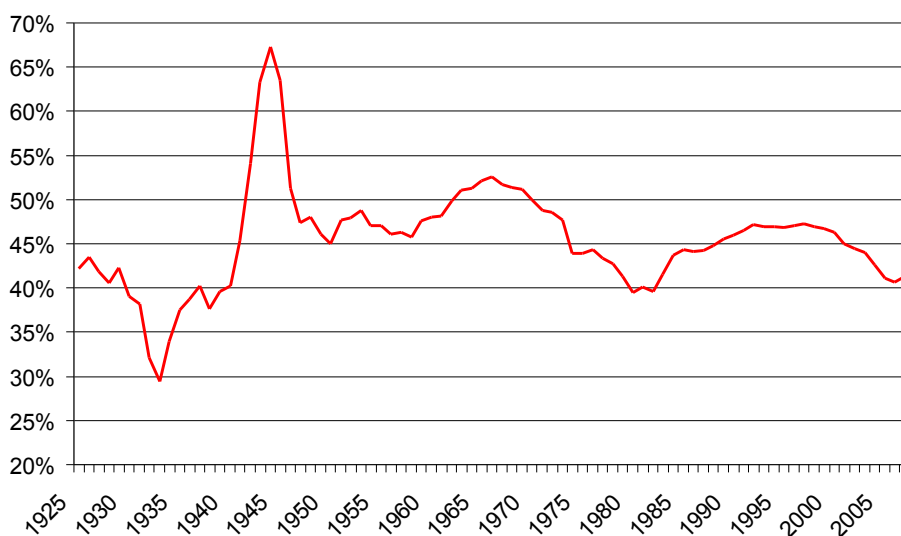
训，可今天采用什么可行的步骤呢？

危机：起源和政策

在了解如何应对危机之前，我们必须弄清引起危机的原因。或者简要的说，就是迫使我们解决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危机本身是由市场的“外部”还是内部因素引起的？其次，如果市场本身是引发危机的原因，那么政府怎样才能在不废除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寻求出路呢？传统经济学给不了任何答案，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并且它笃信市场不会失灵。经济评论家不断地强调危机的表面外因：货币管理、法规、奖励文化-除市场之外的任何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信贷的最初反应是，仅采取细微的调节措施以使其恢复原状。但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道路”本身而非表面现象。而且，对此并没有任何暂时的权宜之计。从1974年起，对于连续的商业周期很少推迟估算，而是将未完成的定位于当前账单上。

信贷失灵没有引发危机，而危机导致信贷失灵。这是资本主义积累正常循环的结果，它根植于世界经济长期的结构性弊病，其中存在着根本的盈利问题，三次危机的根源：1893年，1929年和2008年。我重点讨论这一次经济危机。笔者在本书其他章节将讨论影响产出和分配的重要因素。^b

图5-3：1925-2007年美国最高利润率（增值/股份）



来源：BEA和读者统计

为了准确地研究问题，我们应该理想化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率。由于目前还无法获得数据，我们比较这场风暴的中心-美国的利润率。图5-3表示了美国可能的最高利润率—如果工人工资为零的话。除了削减工资、盗窃储蓄、金融政策或任何此类措施，没有任何“聪明”的方式改善这一利率。图中显示了美国资本主义从长期资本投资中预期可以得到的平均回报的绝对上限。在20世纪80年代突增后，利率恢复了以前下降的趋势，并在战后几年内跌宕起伏。

^b Freeman, A. and Kliman, *The New Value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不能有效“修复”银行系统或其他表面原因的表现。稳步下降的收益率降低了新资本回收的几率，而这种资本是可以通过有效说服投资者投资获得的。它使投资失去生产性，使增值生产投资更短，更具有投机性领域-首先经营，然后融资，最后实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理想世界，Madoff式Ponzi计划，和没有内在资产的投资。如此疯狂的事情发生在每一场危机：所有的学生都对1893年和1929年银行危机与最近的这次危机的相似性感到震惊。

也就是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当国家干预达到最高时恰恰是收益率的峰值。这怎么可能呢？遗憾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起因方面并不完善。根据Kliman和本人的观点，以“physicalist”和“simultaneist”^a为理论特色，利润率基本上不会下降。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即便历史学家，如曾经记录过类似收益率变化过程的Brenner，以类似方式讲述其关于传统经济学的经验，并归咎于表面因素，如竞争、管理、或社会结构。

事实上，利润率的降低恰恰是其本身增长的结果，这就引出了这样的矛盾：只有通过停止增长才能恢复利润率。每年都有一部分盈余再投资到生产中，这便增加了资本总额。新生产的剩余价值不能超越劳动者所确定的人口增长极限，被无增长限制的大量资本分割时产生回弹。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下降。扭转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而矛盾的是，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销毁资本。

物理主义预测，通过减少成本的技术变革无法实现利率降低。这确实降低了资本主义投资的货物价格，如工厂，原材料等。但是，尽管资产价值下降，过去的投资并没有下降。所花费的金钱和所有可能借到的资金都仍然是总投资资本的一部分。即便在法警到达门前时它仍作为索赔价值存在：一是作为不能解除的债务，其次是作为有毒资产，一种过去资本的负面影响。在所有的表现形式中，这是一种规定了价格的收入索赔。

危机的部分功能是减少所有虚拟资产达到其真正价值，流动资金匮乏（“信贷紧缩”）与膨胀债务资产价值暴跌（“债务通货紧缩”）相吻合，以及投资罢工。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以下简称“multiplier”），进一步降低了下岗和无工资来源的工人的需求，将需求减少转为需求衰退。

然而，这是不够的，即使是以前投资的潜在资本股票的真正价值，也必须消耗掉。这是功能的衰退，当潜在资本股票上升到目前水平时-这既是由于它以前的延迟政策，不适当措施，也是由于其本身长期积累的作用，最终使得经济衰退变成‘大萧条’。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1893年和1929年所发生的事件。

以上表明了当前的危机体制，但却暴露了其潜在的困难：资本主义如何通过销毁资本来恢复经济？

火神和火星的联姻：战争和国家生产

^a 参见Freeman, A. Why does the Profit Rate Fall? A critique of Robert Brenner's Theory, 和 Confronting the Evidence: Marx and the Historians on the Profit Rate 中有详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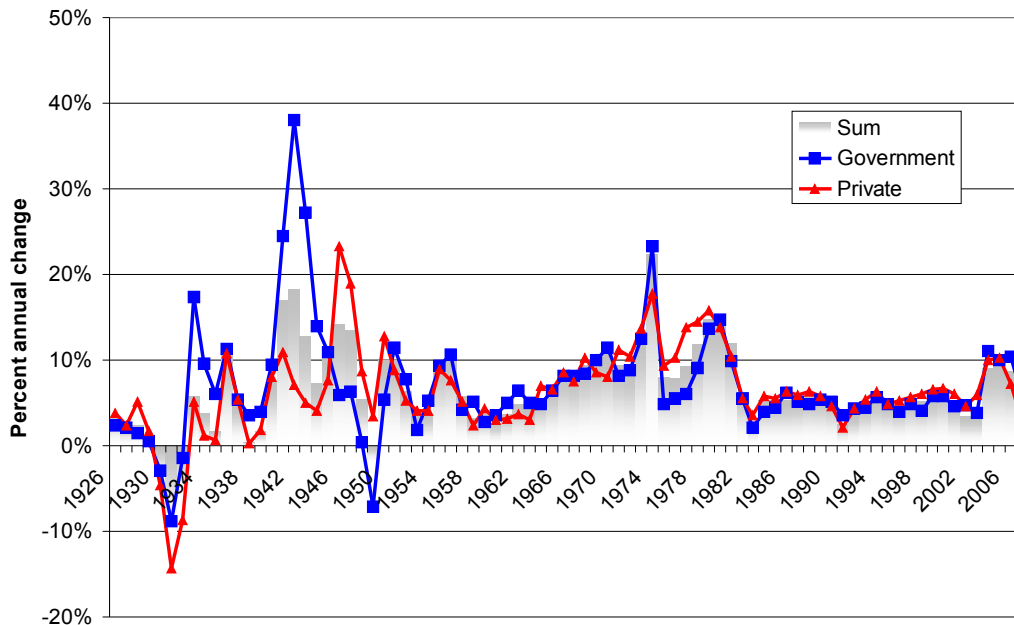


图 5-4: 非住宅净资本存量增长率

来源: BEA

战争期间, 政府采取取代和恢复资本主义并行的措施。如何行动?乍一看, 这是一项通过取出心脏来救治病人的外科手术。布拉姆史托克球迷都知道, 心脏问题不会折磨亡灵。国家、历史利益的忠实保管者, 将资本安置于墓穴以便随后的复苏之用。战争促成了社会团结, 以确保暴徒的需求限制在当前、遏制在未来, 这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传达的残酷承诺。

如前所述, 图5-4表明, 在美国战争期间, 积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私人资本净积累, 虽然受到政府投资的阻碍, 1939年之后增长仍然十分迅速-但国家仍以压倒性优势位居投资首位。如此大规模的积累怎样才能克服这种积累低于收益率的通用规律? 因为国家投资需求没有资本回报率,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没有收益的”。国家监督公民生产能力大规模的扩大, 而不需要私人资本的投资, 或者接受资本回报率的降低。

大量私人成本纷纷倒闭, 但其收益却猛增。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劳动人口的增长有利于更大的资本存量, 图5-4表明, 美国的积累减少了, 按比例来说, 至少要到1946年或许更长时间-政府投资在同一时间恢复和重建国家生产能力, 恢复盈利率才能达到如图5-3所示的战后惊人水平。

战争通常被视为破坏时期, 大量资产在“重建”基础上重建。这是战败国的规律。对于美国来说, 战争及其后果带来的是极强的建设能力。马歇尔计划源于战争: 作为新兴的世界工业超级大国的美国, 为世界普遍性及支配工程, 即战后重建提供了资金。^a

^a 这一点同 Rosa Luxemburg在19世纪60年代Michael Kidron的论述是不同的。后者指出, “长久的军事经济”, 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试图来论证里根主义的经济成功之处。二者都将军事开支视为一种需求。战时政府得以恢复经济, 但其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超出了消费者的范畴。

在今天，这样的重建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呢，如果可以，又是如何实施的呢？

让我们聆听音乐、欣赏舞蹈：21世纪展望

有一个不关乎战争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如果国家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资本主义带来的平等机会，进一步使得私人资本不会再现，这场危机即将结束。

对于数十亿人民和全人类来说，这种经济解决方案势必造成巨大飞跃。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方案可能会包括的少一点。

综合经济意义和社会需要，这可以使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现实。但是又有多少国家会真正实施呢，哪怕是部分国家？我们不能由先前的任何假设开始，最负责任的做法是，要求这些措施从任何一个或每一个声称要解决今天经济或社会问题的人开始做起。然而，对于回应者而言，却是不合适的。

富有国家的障碍是双重的，首先，在和平时期，私人投资者将不得不放弃迄今为止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放弃的特权。其次，一个真正的普遍性解决办法将扭转150年的南北不平等趋势，召唤起各类依靠反动寄生特权生存的各阶级的最强有力的反抗，其中有食利者、金融公司、企业大亨、土地巨头、殖民阶级和普通诈骗者。在无需巨大政治意愿的反制措施前提下，北半球需要缓解大幅下降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而南半球的廉价商品将由这些人负责处理。

没有理由放弃这些提议，然而这也就是说，问题会被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在那些现在已经伸展了经济肌肉的国家，普遍性趋势延伸到核心地带之外，因为他们目睹了美国势力的不断侵蚀。近年来，最大的两个讽刺，一方面是源源不断的希望，即中国直到最近仍无休止进行的市场道德讲座，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委内瑞拉利用其石油以更好地改变本国穷人的条件所展开的长篇大论。

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便达到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最低标准，也是一种极大的推进。诱惑在于，通过减少普遍所有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其目的仅仅是“脱贫”。

这是错误的，且不会起作用。普遍性并不意味着要让富人愿意让步，而是上升到穷人有权达到的水平。在其目前的发展状况下，普遍性意味着宣称，在当前发展阶段，社会拥有给予的前景，并将其视为权利。

由于这个原因，理解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历史远见。先前的城市波动带来的不仅是最基本的而是最先进的时代发展能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最先进的发展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的结论也是矛盾的：物质需求当然必须得到满足，并消除百年来毫无意义的贫困。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新的关键点：扩大“人力基础设施”-人类精神和创造能力-达到目前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水平。这不仅是可以实现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节，我将对其加以概括。

21世纪不可剥夺的权利：创造力、知识产权、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奥巴马的政策中是如何提出他的“绿色”产业计划的？如果他只资助一小部分目前正在争夺制造绿色能源或运输免费矿物燃料的产权的经济，那么他将不会成功。变革需要那些受过教育的、准备充分、并且有能力的人来实施，并且是在战后的规模下进行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决心实现变革的总统需要打败石油游说者、消除城市拥挤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共交通重建、重新配置整个废物处置和发电系统，并能够创造足够的需求，以满足这些少数挣扎行业削减他们的产出价格，达到目前的十分之一。他必须把可持续性的覆盖范围控制在普通公民之中，也就是说，他将不得不在人权议程上增加“生存的可持续性”。

或者，假设英国政府要兑现其提升创意产业的承诺，只通过资助高等艺术，保护婴儿娱乐业免于崩溃，或建立另一个半球，这还是不够的。只要参与艺术依然是一个昂贵的或精英者的特权，创造性活动将永远都只是奢侈性的经济部门。

政府认真寻求策略扭转局势，这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必须使创造性活动成为一种公众权利；它必须资助普及免费高速网络；必须通过拟定审美和设计准则，来建立所有私人 and 公共合同，为大量设计业提供稳定的燃料需求；它将大学教育普及到绝大多数的人之中，并争取在每个城镇都建立一所大学；它必须确保教育，从早期就能为公众提供接触艺术和获得良好鉴赏的机会。^a

总之，在福特时期创造了一个建立在大规模的生产和物质消费基础上的文明，21世纪需要建立起在大规模生产和精神消费基础上的文明。

这些可被视为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符合事实。在任何时期，那些在社会上取得物质的可能性，最终转化成所谓的政治可能性。当今社会的物质现状不仅是准许一个绿色、艺术主导的未来，而是他们必须要实现这些。

Chernomas^b已提请注意凯恩斯“后稀缺”社会的理念，包括“越来越多的阶级和人民的经济必需品，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

从技术上讲，这一状况目前已经存在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世界生产能力的关注已经慢慢减少或几乎不被关注，发生了转化。目前的世界平均实际收入为6000美元，大于1950年先进国家普通公民的平均收入，进入繁荣的“黄金时代”。换句话说，实际上，如果世界选择，现在就有能力立即履行联合国宪章。

世界生产量不再受物质必要性限制，贫困的存在不是因为短缺，而是因为具有如此大的生产力需求的大众市场，被世界五分之三到四分之三的人口消除殆尽，甚至落后于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国家的工人。在这同一个世界，即使是在“先进”国家，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无法得到健康医疗，18岁以上的人有幸接受教育或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尊严有幸得到尊重，远远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处于半永久性的无家可归的威胁之下，这主要是由失业导致的债务和社会破坏造成的。

简而言之，问题不再是任何生产缺失，而是社会体制造成的。在纠正巨大的强加

a 参见 Freeman, A. Cultur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中的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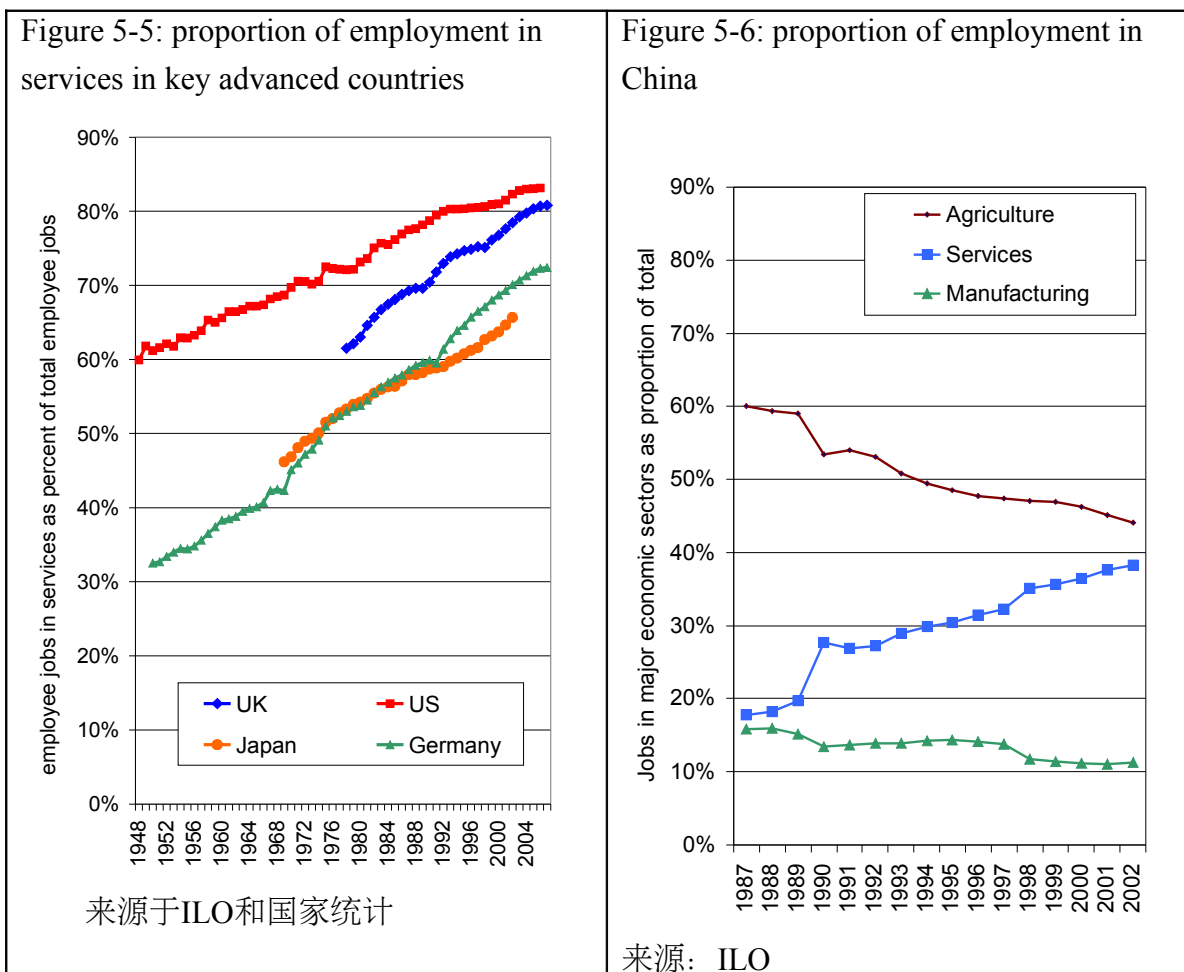
b Chernomas “Keynes on Post-Scarcity Society”

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上的负担的同时，我们既不能要求资本主义的消费者立即停止，现在那些生产者也不应该失去工作。这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并且与社会逆行。

将投资限于仅维持基本生存，是为了躲过目前世界发展道路的转折点。“物质”生产-粮食，建筑，机械-已经历了根本的转变。先进国家70%以上的工人目前提供服务。这是一个世界趋势，甚至对于发展中世界也是一个新的增长路径。相对于这些流行的神话，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减小，员工只有人口的10%。五年之内，更多的中国工人将提供服务而不是生产农作物。

图5-5: 在关键的先进国家服务业人员的比例

图5-6: 中国员工比例



与产业革命的起源的比较也许可以解释危机产生的根源。当时，最有必要性的就是生产足够多的农产品以维持生存。“天天都有面包”就是一切。制造业以最微不足道的插曲出现在起跑线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即重农主义，视土地为唯一的价值来源。给予地主阶级保守需求的发言权，它成为了这样一个障碍，即阻碍了由解雇反重农主义挑起的法国革命的提前爆发。

我们决不能重蹈制造业和服务业间关系的覆辙。从Adam Smith开始，除了马克思一个典型的例外，经济学家左、右两派认为服务业是一种“不真实的”、“没有生产力

的”、“真实工作”的贫穷伙伴。正如我所分析，“machinocratic”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时代的关键之处：服务业目前占据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非生产性”。财政部门，或者说狭义的金融中介，在伦敦300万服务人员中雇佣了不到20万。剩下的，以任何合理的定义为生产性。要求他们返回确切意义上的纯粹物质生产。伦敦、纽约、或多伦多未来的劳动力依赖于工厂的设想退回到19世纪农业乌托邦式的建议，那时的产业工人应该迁移回到土地。城市的普遍性未来在于，投资于文明带来的对于他们的生产的大量需求。

当今三个最大的媒体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姆-有一个共同的资本，相当于Exxon的一半。像索尼这样的大公司成功实现了由制造业做主导地位到主要销售艺术品的跨国公司巨头的过渡。材料的生产对于他们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放大器、电缆、电子技术和互联网，音乐和电影都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对什么进行投资，才能维持这一行业呢？如果没有人制造音乐谁来购买ipod呢？

现代文明的资产不再仅仅在于机器的大小和豪华，而在于工人的创造力和智力，使得机器运转。培养创造性，获取知识，或者，实现有必要并且也是可能的可持续发展，这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定义，是最古老的和最人性化的。

这样就很容易招致谴责，因为它对于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袖手旁观。对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而言，学问、音乐无任何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的组建，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旨在在委内瑞拉建立全面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这，只是徒劳。这样的推理是大错特错的，因其已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假使之前有过的话——如果妄图抢夺一个人的食物来满足另一个人的艺术需求。然而更糟的是：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任何特权群体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他就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从事艺术工作或接受教育。而爵士乐、说唱、舞蹈又从何而来呢？艺术只是受过教育的有钱白人的奢侈品，这种观点受到了驳斥。艾玛·古德曼有句名言是：“如果我不会跳舞，我就不会加入你们的革命。”至今，在西海岸工团主义的顶峰时期，仍有其现实意义。

那种穷人只需填饱肚皮的想法是所有尝试保留特权的人的出发点，对于他们需求的限制只是移除设置在富人身上的限制的另一种方式。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吃饭、穿衣，但是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都是将穷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间接方式——以此来抢夺他们的食物，并保持对他们的不公正性。

我们现在视为奢侈品的人类欲望和需求，可以而且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远景规划中。这不仅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正是文明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Addison, Paul。1975。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Jonathan Cape.

[2]Aglietta, Michel, and D。Fernbach。2001。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London: Verso。

- [3]Bigelow, B ° & Peterson, B ° (Eds.) ° 2002 °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Teaching for justice in an unjust world ° Milwaukee, WI: Rethinking Schools Ltd.
- [4]Chernomas, R ° 1984 ° “Keynes on Post-Scarcity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VII, 4.
- [5]Desai, R ° and A ° Freeman, 2009 ° How Bad is US Unemployment? On www.debtonation.org, February 8th, 2009.
- [6]Dostaler, Gilles ° 2007 ° Keynes and His Battles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 [7]Dunlop, J.T ° and Galenson, W ° eds., Labo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 ° 30 °
<http://www.bls.gov/opub/cwc/cm20030124ar03p1.htm#37>, accessed 2/16/2009
- [8]Freeman, A ° 2004 ° “Confronting the Evidence: Marx’s Historians on the Falling Profit Rate.” Available at mpra.ub.uni-muenchen.de/5590/1/MPRA_paper_5590.pdf
_____ ° 2009 ° Why does the profit rate fall? A critique of Brenner’s theory ° Available at mpra.ub.uni-muenchen.de/5590/1/MPRA_paper_xxxx.pdf
_____ ° 2009 ° “The Poverty of Statist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1
_____ ° 2009 ° Cultur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 http://mpra.ub.uni-muenchen.de/9007/1/MPRA_paper_9007.pdf
- [9]Freeman, A ° and G ° Carchedi ° 1995 ° 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0]Freeman, A., A °Kliman, and J °Wells °2004 °The New Value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1]Freeman, C °1989 °“The Third Kondratieff Wave: Age of Steel, Electrification and Imperialism” Kihlstrom et al ° et al ° (eds.),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Lars Herlitz, Gothenburg.
- [12]Harvey, David ° 1991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 Oxford: Wiley-Blackwell °
- [13]Keynes, J °M °1972 °Essays In Persuasion, Volume 9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 London: The McMillan Press.
- [14]Kidron, M ° 1967 ° “A Permanent Arms Econom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8](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kidron/works/1967/xx/permarms.htm), Spring ° Available at www.marxists.org/archive/kidron/works/1967/xx/permarms.htm
- [15]Kliman, Andrew ° 2006 ° Reclaiming Marx’s Capital: 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 ° Lexington Books °
- [16]Lenin, V ° I °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index.htm#ch06> accessed 2/16/2009
- [17]Perez, C ° 2004 °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volume one, 1935-1948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18]United Nations Charter: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